

《诗经》之《鲁诗》传授考

左 洪 涛

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，逐步认识到儒学对于巩固其统治具有重要作用，因而广开献书之路，准许私人传授先秦儒学典籍。这些典籍后来被立于官学传授并被整理出写本，《诗经》是最早立于官学的。为了讲述的方便，这些写本都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，故称为今文经。

西汉时期今文经《诗经》共有鲁诗、齐诗、韩诗三家（古文经毛诗到东汉才立于官学），形成《诗经》流传史上著名的“三家诗”。《诗经》之《鲁诗》以流传于鲁国而得名，最著名的传授大师是鲁人申培，后被尊称为申公。西汉初年，五经以《诗经》最早出现，而《诗经》又以《鲁诗》出现最早，流传最广，说诗最精，立官学最早，因此影响也最大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：“汉兴，鲁申公为诗‘训故’，而齐辕固、燕韩婴皆为之‘传’，或取《春秋》，采杂说，咸非其本义，与不得已，鲁最为近之。”^①《史记》亦云：“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，申公独以《诗经》为训故以教，无传。疑者则阙不传。”^②由此可见《鲁诗》的传授重点在“训故”，着重依据经文字句作解释。这表明《鲁诗》在学风上比较朴实保守，接近经义，与《齐诗》、《韩诗》迥然不同。与《毛诗》相此，三家诗大多采用杂说和《春秋》来附会诗义，不能解说诗的本义，《鲁诗》比齐、韩两家更接近诗之本义。因此，考察《鲁诗》的传授，是《诗经》学中很有意义的事情。

自汉武帝独尊儒学以后,传授经学者逐渐增多。弟子跟着经师学习,能通一经者就可以做官,于是经学的传授就有了师承关系。凡是被立为博士的经学大师的经学,便成为师法的对象。汉代博士讲经,最重师法。“汉人最重师法。师之所传,弟之所受,一字毋敢出入”。^③ 西汉重师法,东汉重家法。这都涉及经学的传授。

关于经学的传授问题,前贤今哲做过一些探讨,但都是从整体上对经学进行研究,并不专门对某一经某一家进行考证。关于《鲁诗》的传授情况,没有任何两家的记载是完全相同的。除王国维先生的《汉魏博士题名考》外,其他各家只有简略的、仅列人名的传授表,无考证内容,可信度不是很高。具体地讲,王国维在《汉魏博士题名考》的《两汉博士·诗博士》中,考得《鲁诗》博士计西汉17人,东汉5人。^④王先生是一代宗师,然该书不是专考《诗经》的,只考立为博士的学者。由于《鲁诗》的一些传授者没有被立为博士,故而难免有一些遗漏。范文澜在《群经概论》第四章《诗》中,附录表有《〈鲁诗〉的传授》(以下简称范著)^⑤,列17个传授者,仅有5行字。王治心在《中国学术体系》第四章第二节《两汉传授系统表》中(以下简称王著)^⑥,有《〈鲁诗〉传授表》,共列传授者19人。刘汝霖《汉晋学术编年》卷一亦附有《〈鲁诗〉传授表》(以下简称刘著)^⑦,共列传授者35人。今人孙钦善《中国古文献学史》第二章《两汉》中(以下简称孙著)^⑧,对《鲁诗》的传授亦列一个简表,计26人,内容与前贤亦不尽相同。最有分歧的是,他们所认为的《鲁诗》传授师承关系不尽相同,至今尚无学者对该问题进行考证。现代经学家周予同的《周予同经学史论选著集》,没有谈及三家诗。

笔者不揣浅陋,以以上各家的有关叙述为线索,根据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有关记载,同时参考《后汉书》、《经典释文》、《三家诗遗说考》、《诗三家义集疏》、以及毕沅《传经表》中所列的简略的《鲁诗》人名为线索(以下简称毕著)^⑨,从中爬梳剔抉,比较优劣,共考得46人(《鲁诗》传授一览表在第16页)。现在整理成文,提出来讨论。以

期在今后的进一步研究中,能对《鲁诗》传授的研究有所裨益。

一、《鲁诗》的源头

今、古文经起源于何时,至何时开始分离,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问题。一些学者认为《鲁诗》最初的传授者是荀卿。如刘著的《鲁诗传授表》首列荀卿,范著亦持相同的看法。

细考之则不然。陆德明云:“徐整云,子夏传高行子,高行子传薛仓子,薛仓子授帛妙子,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,毛公为《诗》故训传,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。一云子夏传曾申,申传魏人李克,克传鲁人孟仲子,孟仲子传牟根子,牟根子传赵人孙卿子,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。”^⑩陈乔枞在《鲁诗遗说考·鲁诗叙录》中云:“《序录》所记云云者,即陆玑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之说。陆德明意似以徐整为正,整以吴太常卿与陆机同时,后玑要以大毛公为受自荀卿,于古传记无所征证,而申公《鲁诗》传浮邱伯,为荀卿再传弟子,具载于《汉书》,章章可考。则陆玑所记子夏传曾申云云,当为《鲁诗》授受源流确然无疑。书缺有间,简篇断佚失次,后人遂以此节属之《毛诗》耳。”可见陈氏认为《经典释文·叙录》所云是《鲁诗》而非《毛诗》的传授系统,这虽然有一定的道理,然历代习《毛诗》者一般认为徐整、陆玑所言乃《毛诗》的传授。笔者以为,在荀卿之前,《鲁诗》与《毛诗》的传授者相同,这样两说的分歧就统一了。如刘师培《经学教科书》第六课《孔子之传经》云:“《诗经》之学,由孔子授子夏,六传至荀卿,荀卿授《诗》浮邱伯,为《鲁诗》之祖;复以《诗经》授毛亨,为《毛诗》之祖。”王治心《中国学术体系》和刘师培《经学教科书》都认为《诗经》最初的几传是:子夏-曾申-李克-孟仲子-根牟子-荀卿<毛亨 浮邱伯。以上二位学者虽在书中没有明言鲁、毛两家同祖,但

从他们所列的《鲁诗》传授表来看,他们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这一点。陆玑的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、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叙录》、毕沅的

《传经表》都持相同的观点。由此可见,《鲁诗》、《毛诗》的源头都出于子夏,本文下一部分还要论述。

二、申公之前的七传

1.曾申、李克、孟仲子、根牟子

上一部分已谈及子夏以后的几传是曾申-李克-孟仲子-根牟子。早在三国时期已有学者论述,陆玑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云:“孔子删诗授卜商(子夏),商为子序,以授鲁人曾申,申授魏人李克,克授鲁人孟仲子,孟仲子授根牟子,根牟子授赵人荀卿。”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叙录》又云:“曾申,字子西,鲁人曾参之子。”郑玄《诗谱》亦记载孟仲子的简况:“孟仲子,子思之弟子。”由于年代久远,有关记载太少,子夏以后的四传,只能考得如上材料。

2.荀子

荀子既是儒学大师,又是传授经学的大师。荀子在《鲁诗》传授者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“荀子是在孔子之后,对《诗经》贡献最大的传经大师。”^⑩《史记·孟荀列传》司马贞《索隐》曰:荀卿名况,卿者,时相尊而号为卿也。然亦谓之孙卿子者,避汉宣帝之讳也。”汉宣帝名刘询,故后人改荀卿为孙卿。荀子是传经大师,对于儒家经典的传授,清代汪中在《荀卿子通论》中有论述:荀卿之学,出于孔氏,而尤有功于诸经。……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歿,汉诸儒未兴,中更战国暴秦之乱,六艺之传,赖于不绝者,荀卿也。”在传经事业上,荀子是子夏以后、董仲舒以前的灿然晨星,无人能出其右。具体到《诗经》,汉代应劭云:“孙卿善为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”^⑪据山东大学董治安先生统计:《荀子》一书共引经98次,其中引《诗经》82次,又论《诗经》12条,可见荀子长于《诗经》^⑫。荀子和鲁诗的关系,前面已有论述,又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云:“(浮邱)伯者,孙卿门人也。”而申公又是浮邱伯的弟子,“是申公之学出自荀子,《荀子》书中说《诗》者,大都为《鲁诗》所本。”^⑬则荀卿所传的应是《鲁诗》。

3.浮邱伯

浮邱伯与毛亨同受师于荀卿,《鲁诗》是从他开始,才具有自己的特色。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颜师古注云:服虔曰:“浮邱伯,秦时儒生。”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又云:“(王)少时尝与鲁穆生、白生、申公俱受《诗》于浮邱伯。伯者,孙卿门人也。及秦焚书,各别去。”“高后时,浮邱伯在长安,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。”西汉桓宽的《盐铁论·毁学篇》也保留了浮邱伯的一些资料:“大夫曰:昔李斯与包邱子俱事荀卿。包邱子饭麻蓬藜,传道白屋之下,乐其志安之于广厦刍养,无赫赫之势,亦无戚戚之忧。”桓宽所言包邱子与浮邱伯是什么关系呢?陈寿祺云:“包邱子即浮邱伯也。包浮音近,古相通假。^⑯钱穆先生亦云:“然则此‘包邱’盖即汉初传诗之浮邱伯矣。”^⑰陈寿祺、钱穆所言极是。“浮”在上古音属并母幽部字,包是帮母、幽部字。据钱大昕云:“古无轻唇者。”浮、包同音,在古书中替代的情况很多,又如:伏羲又作庖羲。“子”同“伯”义,都是男子的美称,与某君某生同义,因此,包邱子就是浮邱伯。故陈乔枞《鲁诗遗说考·自序》又云:“刘向校录《孙卿书》,亦云浮邱伯受业于孙卿,为名儒。”

4.申培

《鲁诗》的传授系统中,申培是最重要的人物,他把《鲁诗》发扬光大,使《鲁诗》成为当时今文经中最重要的显学,更是三家诗中最强盛的一派。《史记·儒林传·叙》云:“(汉兴),言《诗》于鲁则申培公,于齐则辕固生,于燕则韩太傅。”司马迁在《史记》对申培的记载较为详细,《史记·儒林传·申公》云:“申公者,鲁人也。高祖过鲁,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。吕太后时,申公游学长安,与刘郢同师。……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。申公独以《诗经》为训以教,无传,疑者则阙不传。”汉武帝即位之初,因为立明堂需要一位学问和威望都很高的人,就找到了申公,“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,弟子二人乘轺传从。至,见天子。天子问治乱之事,申公时已八十余,老,对曰:‘为治者不在多言,顾力行何如’”。

耳”。是时天子方好文词，见申公对，默然。然已招致，则以为太中大夫，……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……言《诗》虽殊，多本申公。”^⑩从司马迁的叙述，我们对申公的生平及学术有一了解，《汉书·儒林传·申公》的记载与此大致相同。对申培及《鲁诗》的地位，陈乔枞曾作了下列总结：“《史记·儒林传》言汉高祖过鲁，申公以弟从师入谒于鲁南宫。又言申公以《诗》教授，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。是三家之学，《鲁》最先出，其传亦最广。有张、唐、褚氏之学，又有韦氏学、许氏学，皆家世传业，守其师法。终汉之世，三家并立学官，而鲁学为极盛焉。魏晋改代，屡经兵燹学官失业，《齐诗》既亡，《鲁诗》不过江东，其学遂以浸微”。^⑪陈乔枞对申公及《鲁诗》的评价是公允的。

三、与申培同受师于浮邱伯的同门及其再传

对与申培同受师于浮邱伯的同门师兄弟及再传，各经书记载很少。据毕著的提示，在史书和有关经学著作中可了解到如下情况：

1.楚元王交、穆生、白生、夷王郢客及其再传弟子刘辟彊、刘德
以上传授者都是浮邱伯的弟子，由于楚元王的关系，与汉王室的关系较为密切，在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有记载：“楚元王交字游，高祖同父少弟也。好书，多材艺。少时尝与鲁穆生、白生、申公俱受《诗》于浮邱伯。”“元王既至楚，以穆生、白生、申公为中大夫。高后时浮邱伯在长安，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。”可见夷王郢客虽是元王交子，但所受《鲁诗》并非其父所传。《汉书·儒林传·申公》云：“吕太后时，浮邱伯在长安，楚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学。”上述内容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也有记载，夷王郢客和申培也是同学《诗》于浮邱伯的同门弟子。

2.二传弟子刘辟彊、刘德

此二人都是楚元王交的后人，故楚元王的传记中有两人的介

绍,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云:“初,休侯富(元王子)既奔京师,而王戊反,富等皆坐免侯,削属籍。后闻其数谏戊,乃更封为红侯。”“富子辟彊等四人供养,仕于朝。”“辟彊子德待诏丞相府,年三十余,欲用之。或言父见在,亦先帝之所宠也。遂拜辟彊为光禄大夫,守长乐卫尉,时年已八十矣,徙为宗正,数月卒。”该传言刘辟彊好读《诗》,能属文,虽未言其习何《诗》,然刘辟彊是楚元王孙,其家世习《鲁诗》,则其习为《鲁诗》,也应在情理之中,其子刘德亦然,下面还将作较详细的论述。

3.三传弟子刘向

刘向是历史上著名的古文献学家,与其子刘歆校理群书,编撰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,在校勘学、目录学上总结出丰富的经验。《汉书·楚元王传·刘向》云:“向字子政,本名更生。”传称刘向校书之际,正值成帝舅大将军王凤秉政,倚太后,专国权,兄弟七人皆封为列侯。“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,自近者始,故采取《诗》、《书》所载贤妃、贞妇,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,序次为《列女传》,凡八篇,以戒天子。及采传记行事,著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凡五十篇奏之”。^⑯刘向的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、《列女传》保留了大量的《鲁诗》遗说,足以证明他和他的前辈所习为《鲁诗》。后世学者辑佚《鲁诗》,以上三书是最重要的参考书。

王国维《汉魏博士题名考》、王著、刘著、孙著都未把夷王郢客及其后人习《鲁诗》者列入《鲁诗》传授系统中,然陈乔枞认为:“案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:‘元王少时尝与申公受《诗》于浮邱伯。王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。元王好《诗》,诸子皆读《诗》。申公始为《诗传》,号《鲁诗》;元王亦次之《诗传》,号《元王诗》,世或有之。向为元王子休侯富曾孙。’本传虽未言其习《鲁诗》,然汉人最重家学,知向所述必出于《鲁诗》也。又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:‘成帝诏向校经传诸子。向卒,哀帝复使向子歆卒父业,于是说群书而奏其《七略》,今删其要以备篇籍。’是志所载皆采《七略》之文。其于三家诗,言鲁最为近之,益

足证刘氏父子治《诗》，为宗其家学也。”^②王先谦在《诗三家义集疏·序例》中转引了陈乔枞的这段议论，并对陈的说法给予了肯定。^③朱彝尊亦云：“向乃元王之孙，所著盖《鲁诗》矣。”^④因此我们可以说，夷王郢客、刘辟彊、刘德、刘向都应是《鲁诗》的传授者，漏掉他们是有失允当的。除清代的朱彝尊、陈寿祺父子、王先谦外，范文澜的《群经概论》^⑤，汤志钧的《西汉经学与政治》^⑥也把夷王郢客及其后世习《鲁诗》者列入《鲁诗》传授表中。笔者以为，历代学者辑佚《鲁诗》，把刘向的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、《列女传》作为最重要的参考书，实际上就是承认了他们是《鲁诗》的传授者。

四 申公的一传弟子

1. 王臧、赵绾、孔安国及司马迁

王、赵两位学者在经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，他们是申公很有名的两位弟子。王国维《汉魏博士题名考》限于该书的体例，没有对王、赵两人进行考证。查《汉书·儒林传·申公》：“兰陵王臧既从受《诗》，已通，事景帝为太子少傅，免去。武帝初即位，臧乃上书宿卫，累迁，一岁至郎中令。及代赵绾亦尝受《诗》申公，为御史大夫。”《史记·儒林传·申公传》的记载与此大致相同。王、赵为“独尊儒术”及今文经学统治地位的确立献出了生命，他们的名字已载入史册。

孔安国是以治《尚书》而闻名后世，他也是一位习《鲁诗》的学者。《史记·儒林传·申公传》云：“(申公)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：孔安国至临淮太守……。”《汉书·儒林传》的有关记载与此相同。然而，司马迁从孔安国习《鲁诗》，不仅王国维《博士考》无考证，朱彝尊《经义考》、毕著、范著、刘著、王著的有关《鲁诗》内容中，连司马迁的名字都未提起。但我们从其他典籍中能找到一些线索：《汉书·儒林传·孔安国传》云：“孔氏有古文《尚书》，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，因以起其家，《逸书》得十余篇，盖《尚书》兹多于是矣。遭巫蛊，未立于学官。安国为谏大夫，授都尉朝，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。”孔安

国是《鲁诗》大师申培的弟子,司马迁又在孔安国的影响下学习《鲁诗》,那么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所引《诗》是那一家呢?故陈寿祺《鲁诗诗遗说考·叙录》亦云:案《史记·叙传》自言讲业齐鲁之都,子长宜习《鲁诗》,又《儒林传》言《韩诗》为诗与齐鲁间殊,似不深信韩氏。且子长时《诗》惟《鲁诗》立博士,故《史记》所引《诗》皆《鲁诗》也。”在司马迁那个时代,只有《鲁诗》被立为博士并且影响最大,

陈乔枞《鲁诗遗说考》亦云:“今即以《史记》证之,其传儒林首列申公,叙申公弟子首数孔安国,此太史公尊其师故,特先之据,是以断《史记》所载《诗》必为鲁说无疑矣。”清代学者唐晏也认为司马迁习《鲁诗》,他从《史记》中钩稽出的内容,虽只有十几行,却颇见功力。^②从以上材料中可以看出,司马迁应习《鲁诗》。另一方面,《鲁诗》不仅表现在给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提供史料方面,而且对他的政治观、伦理观、文化观,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也很深刻。今人陈桐生对此也有类似的论述^③。王应麟及清代学者辑佚《鲁诗》,都把《史记》作为重要的参考书,也承认了司马迁是《鲁诗》的传授者。

2.周霸、夏宽、鲁赐、徐偃、缪生、阙门庆忌

上述六位学者都是《鲁诗》博士,《史记·儒林传》和《汉书·儒林传》对以上诸家均有相同的记载。但古今某些学者对此却有不一致的看法,如唐人司马贞和今人孙钦善。《史记·儒林传·申公传》司马贞《索隐》曰:“缪音亡救反。缪氏出兰陵。一音穆。所谓穆生,为楚元王所礼也。”孙钦善在其《鲁诗》传授表所列申培弟子为:“(申培)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:孔安国、周霸、史宽、砀鲁、缪生、徐偃、阙门庆忌等,”^④孙著认为其中两个弟子叫“史宽、砀鲁”。

然《史记·儒林传·申培传》、《汉书·儒林传·申培传》皆云:“弟子为博士十余人,孔安国至临淮太守,周霸(至)胶西内史,夏宽城阳内史,砀鲁赐(至)东海太守,兰陵缪生(至)长沙内史,徐偃(为)胶西中尉,邹人阙门庆忌(为)胶东内史。”(加括号者为《史记》有,而《汉书》所无的字)又王国维《汉魏博士题名考》先列“周霸”条,又

列“夏宽”条,又列“鲁赐”条。^⑧在每条下面,从《史记》中考证出他们的材料,他亦不写作“史宽”、“砀鲁”。笔者以为这可能是脱文、句读方面的问题:孙钦善先生所用的版本无标点,“夏”字又脱文,上述“周霸胶西内史(夏)宽城阳内史砀鲁赐东海太守”就断成了“史宽、砀鲁”。

其次,“缪生”与“穆生”是否为同一人呢?《史记·儒林传·申公传》与《汉书·儒林传·申公传》皆言(申公)弟子为博士十余人,兰陵缪生为长沙内史,而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中鲁穆生与申公是师兄弟。《史记·儒林传》与《汉书·儒林传》所说的兰陵缪生是申公的弟子,班固所言与司马迁同。此两人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相近,司马迁写作风格严肃,班固更不会有错不改。故魏源《诗古微》^⑨、毕著、刘著、今人汤志钧的《西汉经学与政治》^⑩都认为穆生和缪生分别是申培的同门和弟子,申公的弟子有夏宽和鲁赐而非史宽、砀鲁。因此司马贞和孙钦善的新说都是值得商榷的。

五 瑕丘江公、许生、徐公及其各自弟子

1.瑕丘江公(大江公)、博士江公

在有关经学著作中的《鲁诗》传授表里,对瑕丘江公、大江公和博士江公的说法多有不同。《汉书·儒林传·申公》云:“申公卒以《诗》、《春秋》授,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,徒众最盛。及鲁许生、免中徐公,皆守学教授。韦贤治诗,事大江公及许生。”《汉书·儒林传·王式》又云:“式为昌邑王师。昭帝崩,昌邑王嗣立……博士江公世为《鲁诗》宗,至江公著《孝经说》,心嫉式。”在《汉书·儒林传·瑕丘江公传》中又云:“瑕丘江公受《谷梁春秋》及《诗》于鲁申公,传子至孙为博士。武帝时,江公与董仲舒并。”那么,瑕丘江公、大江公和博士江公是何关系?《汉书·儒林传·申公传》颜师古注云:“晋灼曰:‘大江公即瑕丘江公也,以异下博士江公,故称大。’”由此可见,大江公与瑕丘江公是同一个人,是申公的一传弟子,而博士江公是瑕

丘江公的后人。毕著亦认为如此。范著和孙著可能是限于表格的篇幅,未提及博士江公,而王著和刘著把瑕丘江公简称江公,这既可理解为瑕丘江公(大江公),也可理解成博士江公,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说法的不一,指代上的误解。

2. 韦贤、韦元成、韦赏、义倩、卓茂

除卓茂外,以上就是著名的《鲁诗》“韦氏学”的师传。王著、范著、刘著、孙著对此记载略有不同,各有遗漏。《汉书·儒林传·申公》云:“韦贤治《诗》,事大江公及许生。又治《礼》,至丞相。传子玄成,以淮阳中尉论石渠,后亦至丞相。玄成及兄子赏以《诗》授哀帝,至大司马车骑将军,自有传。由是《鲁诗》有韦氏学。”由于韦贤、韦元成及“韦氏学”影响很大,《汉书》特为其立传:“韦贤字长孺,鲁国邹人也……为人质朴少欲,笃志于学,兼通《礼》、《尚书》,以《诗》教授。号称邹鲁大儒。”^⑩该书也有韦玄成的资料:“少子玄成,复以明经历位至丞相。”再者,《汉书·韦贤传附韦玄成》云:“玄成字少翁……少好学,修文业,尤谦逊下士。”“贤病笃,门下生博士义倩等与宗家计议,共矫贤令,使家丞上书言大行,以大河都尉玄成为后。……兄宏子赏亦明《诗》,哀帝为定陶王时,赏为太傅。哀帝即位,赏以旧恩为大司马车骑将军,列为三公,赐关内侯。”

卓茂是东汉人,博士江公的弟子,《后汉书·卓茂传》云:“茂字子康,南阳宛人也。父祖皆至郡守。茂元帝时学于长安,事博士江公,习《诗》及历算,究极师法,称为通儒。……光武初即位,先访求茂,以茂为太傅封褒德侯。”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:韦氏学的传人应有韦贤、韦玄成、韦赏、义倩,以上诸家经学著作在论及该问题略有遗漏。

六 王式、王式之弟子及再传弟子

1. 王式及其弟子张长安、唐长宾、褚少孙、薛广德

王式以《诗三百》作谏书而闻名经学史,其弟子又以建立张、

唐、褚氏之学而出名。对该派传授的记载,有关经学著作只有一二家略有不同:王著认为王式只受师于许生,弟子只有张长安和薛广德;范著认为王式受师于孔安国,弟子有唐长宾、褚少孙,张长安三人。二家孰是孰非?考《汉书·儒林传附王式》:“王式字翁思,东平新桃人也。事免中徐公及许生。式为昌邑王师。昭帝崩,昌邑王嗣立……山阳张长安幼君先事式,后东平唐长宾、沛褚少孙亦来事式,问经数篇,式谢曰:‘闻之于师具是矣,自润色之。’不肯复授。唐生、褚生应博士弟子选,诣博士,抠衣登堂,颂礼甚严,试诵说,有法,疑者丘盖不言。诸博士惊问何师,对曰事式。皆素闻其贤,共荐式。诏除下为博士。”从王式本传中可以看出王式受《诗》于徐公及许生。弟子是否只有张、唐、褚三人呢?《汉书·儒林传·王式传》又云:“初,薛广德亦事王式,以博士论石渠,授龚舍。”可见,王式的弟子还有薛广德,王式受师于徐公和许生,而非孔安国,王著与范著的记载有瑕疵。毕著、王国维《汉魏博士题名考》、刘著、孙著的记载相同,笔者同意这几家的观点。

2.王式再传弟子张游卿,三传弟子王扶、许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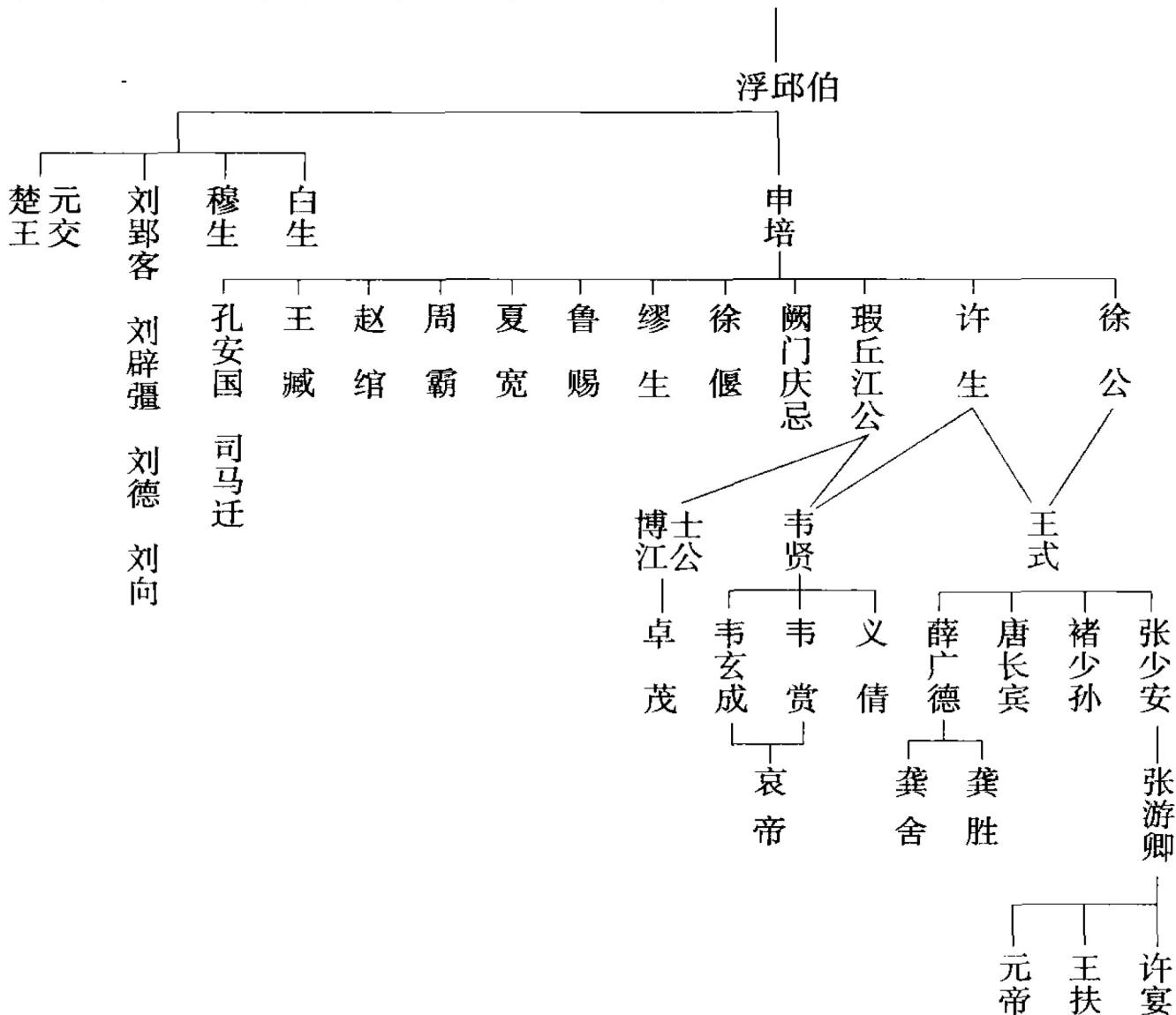
对这一分支的传授,有两家观点颇不相同。孙著认为:王式授张长安、唐长宾、褚少孙、薛广德,薛广德授龚舍而无龚胜,张长安授张游卿、王扶、许晏,张游卿和王扶、许晏是同门师兄弟而非师徒关系。^②毕著认为:王式授张长安;张长安授张游卿;张游卿授王扶,王扶授许晏。^③可见毕著认为王扶是王式的三传弟子,而许晏则是王式的四传弟子。哪一种观点正确呢?

查《汉书·儒林传·王式传》:“初,薛广德亦事王式,以博士论石渠,授龚舍。”此外,《汉书·薛广德传》云:“广德字表卿,沛郡相人也。以《鲁诗》教授,楚国龚舍、龚胜事焉。”从这里可看出薛氏弟子除龚胜外,还有龚舍。从《汉书·儒林传·王式》里查到张长安至许晏的传授:“张生(王式弟子张长安)兄子游卿为谏议大夫,以《诗》授元帝。其门人琅邪王扶(案非王扶)为泗水中尉,陈留许晏为博士。”

由是张家有许氏学。”根据这些记载,我们能查出毕著和孙著的瑕疵:毕著认为王扶是张游卿所授,许晏是王扶所授,从《汉书·儒林传》来看,这是不正确的,王扶和许晏都是张游卿所授。孙著亦有可商榷之处:王扶和许晏是张游卿的弟子,不是张的同门师兄弟,另外,《汉书·儒林传》和毕著、王著、刘著都写作“王扶”,而孙著却写作“王抉”,可能因“扶”、“抉”两字字形相近易混的缘故。

附：《鲁诗》传授一览表

(孔子)一子夏一曾申一李克一孟仲子一根牟子一荀卿



以上是笔者对《鲁诗》主要在西汉时的传授关系所做的考察。而东汉及以后时期则难辨清楚：其一是自王莽建立新朝，立古文经

学者为博士之后,包括《鲁诗》在内的今文经学力量逐渐减弱,两汉末年的大动荡更给《鲁诗》的传授带来困难,习《鲁诗》的人越来越少。其二是《后汉书》作者范晔是南朝宋人,其著《后汉书》在陈寿者《三国志》之后,自汉至南朝宋,历经数次大乱,帝都数次迁徙,典籍散亡。范晔只能说明学者所习何书,至于师承传授则难辨清楚。故本文主要在西汉对《鲁诗》的传授作出力求符合史实的考证。

注释:

- ①、⑯、㉑班固: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,1962年版。1708页; 1928页; 3101页。
- ②、⑰《史记》,中华书局,1959年版。3120—3122页; 3122页
- ③皮锡瑞:《经学历史》,中华书局1959年版,77页。
- ④、㉘王国维:《汉魏博士题名考》,见《王国维遗书》第7册,上海书店出版社,1992年版。21至28页;22至23页。
- ⑤、㉓范文澜:《群经概论》第四章,见《民国丛书》第二编第三册,上海书店,1991年版。第157页;第157页。
- ⑥王治心:《中国学术体系》第四章,见《民国丛书》第二编第二册,上海书店,1991年版。第81页。
- ⑦刘汝霖:《汉晋学术编年》卷一,中华书局,1987年版,第36页。
- ⑧、㉗、㉙孙钦善:《中国古文献学史·两汉》,中华书局,1994年版。第49页;第49页;第49页。
- ⑨、㉓毕沅:《传经表·诗·鲁诗》,见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第270册,中华书局,1991年版。第13页至18页;第13页至18页。
- ⑩陆德明:《经典释文·叙录》,中华书局,1983年版。第10页
- ⑪夏传才:《思无邪斋诗经论稿·关于荀子传诗问题》,南开大学出版社,1995年版。第166页
- ⑫应劭:《风俗通义》第七卷“孔况”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。第51页
- ⑬董治安:《诗经称<诗>平议》,见《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学苑出版社,2000年版。第277页。
- ⑭、⑯陈乔枞:《鲁诗遗说考·自序》,见《皇清经解续编》,南菁书院本,第3页;第4页。

(下转第44页)

- ⑧《四部丛刊》初编影印宋刻本。
- ⑨参见徐俊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》卷中,358页。中华书局,2000年。
- ⑩中华书局影印本,289页。
- ⑪《江文通集汇注》卷二,96页。中华书局,1984年。
- ⑫邓文宽:《新发现的敦煌写本杨炯浑天赋残卷》,《文物》1993年第5期;伏俊琏:《敦煌赋校注》,178页。甘肃人民出版社,1994年。
- ⑬释延寿《观音证验赋》,《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》(《敦煌研究》1986年第3期)著录,张锡厚《敦煌赋汇》(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6年)首次予以校录,作者均作佚名。陈万成《沪藏〈观音证验赋〉残卷考辨》考证为释延寿之作,见于明嘉靖重刻正统本释延寿《感通赋》,题作《观音应现赋》。“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(香港大学)”论文,2000年7月。

作者工作单位: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

(上接第 17 页)

- ⑯、⑰陈寿祺、陈乔枞:《鲁诗遗说考·鲁诗叙录》,见《皇清经解续编》,南菁书院本,第6页;第6页
- ⑯钱穆:《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》,商务印书馆,2001年年版。第193页。
- ⑲王先谦:《诗三家义集疏·序例》,中华书局,1987 年版,第 2 页。
- ⑳朱彝尊:《经义考》卷一百,《四库全书》第 678 册, 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 年版,第 329 页
- ㉑、㉒汤志钧:《西汉经学与政治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4 年版,第 86 页;第 87 页。
- ㉓唐晏:《两汉三国学案》,中华书局 1986 年版,第 217 页。
- ㉔陈桐生:《史记与诗经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0 年版,第 122 至 192 页。
- ㉕魏源:《诗古微》,岳麓书社,1989 年版,第 134 页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